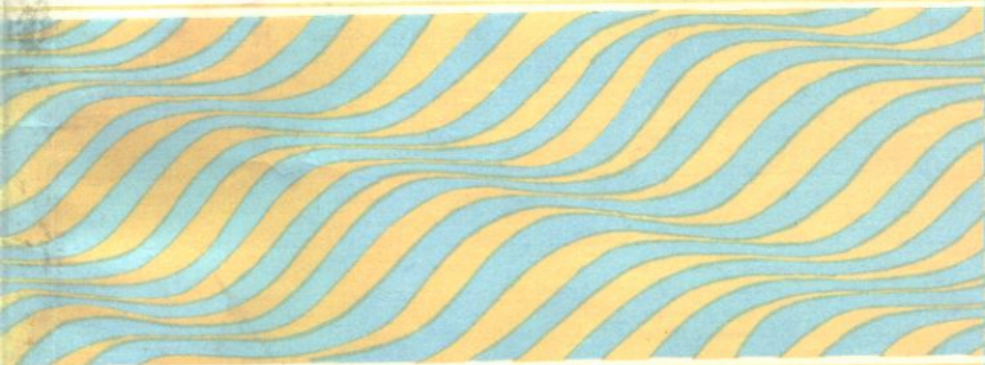


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

●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编著

编写人员：盛增秀 李安民 竹剑平
施仁潮 王 英 蔡文彪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226106

(沪)新登字206号



中国工程研究精华

浙江省工程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编著

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 (邮政编码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9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1010-232-X/R·229

定价：6.80元

前 言

中西医汇通是西学东渐在我国医学界所出现的一股思潮，这股医学思潮萌芽于明末，其间绵延三百余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发展为中西医结合，从而进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今天我们对我国医学发展史上这一特殊的医学思潮，以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进行认真的、客观的总结和研究，从中吸取其经验和教训，这对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在浙江省中医管理局的支持下，编写了《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一书。

本书主要论述了中西医汇通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过程；对中西医汇通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对汇通的代表性医家的学术思想予以详尽的评介；评议了中西医汇通的功绩和贡献；最后讨论了中西医汇通的教训和启示。总之，本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西医汇通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再认识、再评论，旨在为今天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限于水平，书中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三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医汇通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过程·····	(1)
一、中外医学交流的回顾·····	(1)
二、中西医汇通的发展阶段·····	(6)
第二章 中西医汇通的途径和方法 ·····	(42)
一、中西汇通论 ·····	(45)
二、改进中医论 ·····	(45)
三、中医科学化论 ·····	(46)
第三章 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学术思想评介 ·····	(48)
一、朱沛文与《华洋脏象约纂》·····	(48)
二、中西医汇通的理论家唐宗海 ·····	(56)
三、中西医汇通的实验大师张锡纯 ·····	(74)
四、提倡改进中医的恽铁樵 ·····	(105)
五、主张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 ·····	(125)
第四章 中西医汇通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	(152)
一、汇通医家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 ·····	(152)
二、大胆创新,突破旧理论·····	(154)
三、坚定维护中医学,反对循旧复古·····	(156)
第五章 中西医汇通的教训和启示 ·····	(158)
一、中西医汇通的几点教训 ·····	(158)
二、中西医汇通的启示 ·····	(163)

第一章 中西医汇通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过程

明末清初以来在我国医学界曾出现一股特殊的医学思潮——中西医汇通思潮，这是在我国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而逐渐产生的。它旨在保存和发展中医学，吸收西洋医学之长，融合中西医学，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回顾中西医汇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科技发展状态，对我们辩证地、历史地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外医学交流的回顾

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界性的科学文化交流始终存在。我国是文明古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曾对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一部分的中外医学交流，早在战国和秦代，我国医学就传到国外。据传，秦始皇命徐福率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到达日本九州，在徐福随行人员中有百工技艺，其中就有医药人员。另外我国医药也通过陆路传入朝鲜，并从朝鲜传入日本。

两汉时期，是一个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拥有五六千万人口的国家。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亚洲大陆内部的通道，中外经

济和包括医学在内的文化交流开始了新纪元。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佛教传入中国,当时印度医学操之于僧侣之手,随佛教的传入,印度医学亦逐渐传入。《开元释教录》就有“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的记载。隋唐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中外医药交流也日益增多。我国医药学不断向外传播。朝鲜、日本等国都派人到我国学习医学。公元 514 年,梁武帝应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693 年,朝鲜设博士专授中医学。传授课程、学制均仿唐朝。授学生《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典。552 年,梁元帝赠日本使臣《针经》。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籍 160 卷至日本。608 年,日本推古天皇遣惠日等来我国学医,于 623 年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大量医书。733 年,日本荣睿、普照等又来我国学医。十年后专程赴扬州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讲学,鉴真率弟子数十人,先后六次渡海,历尽艰苦,终于于 754 年到达日本,他传授的中医学,对日本医学发展有重大贡献,被后世称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他带去的“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医方,至今仍为日本人民所乐用。

唐代,高僧义净于高宗咸亨初往西域,遍历三十余国,到达印度,经二十年,以中医中药为印度人民治病。我国的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附子、乌头、细辛等中药,由于有出色的疗效,被印度人民誉为“神州上药”。

唐时,我国的脉学、炼丹术等也逐渐传入阿拉伯,并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对世界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医药学不断向外传播的同时,国外医药也逐渐

传入我国。如阿拉伯的乳香、没药、血竭等输入我国。唐乾封二年(667年),大秦(罗马和东罗马帝国)使节曾带来“底也迦(Theraica)”,是以鸦片为主要成份的复方制剂,是欧洲中世纪有名的万病感应剂。当时底也迦输入中国很盛,《医方类聚》引《五脏论》(见《隋书·经籍志》)说:“底也迦善除万病”。苏敬等修撰的《新修本草》亦记载了“底也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癆、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

唐代西方景教的传入,也带来了西方医药。景教徒除传教外,还从事经典翻译及医疗活动。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忤之,寒者来应之,病者起而疗之,死者葬而安之。”

宋元时期,蒙古民族的崛起和三大发明的直接影响,海陆交通日益发达,我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医药的交流。据《宋会要》记载,宋代由“市舶司”出口,经由阿拉伯转运至欧洲各国的药物有60多种,如朱砂、人参、牛黄、茯苓、附子、胡椒等。其中牛黄,更是被欧洲人奉为辟疫圣药,贮以金银之盒以珍藏之。

我国宋代对外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因此,我国与东南亚诸国如真腊、丹眉流、罗斛、渤泥、阇婆、三佛齐等国均有频繁的贸易和医药交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仅乳香一物,交易额动以亿万计。1973年8月,福建泉州湾发掘到宋代沉船一艘,舱内出土大宗药物,有乳香、水银、朱砂、槟榔、胡椒、玳瑁、沉香、檀香、降真香等数十种。泉州是我国古代沿海对外主要贸易港口之一。其药物交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药物方面交流外,外国医学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少。如元代设立的“广惠司”,即是仿效阿拉伯医院形式建立起来的

医疗机构，它还聘用阿拉伯医生治病。设立的“回回药物院”，专售阿拉伯药物。同时翻译了不少阿拉伯医药书籍，如《回回药方》等。

元蒙统治阶级中许多人信奉景教，景教寺院遍及全国各地。据考，这些寺院都曾经有为平民而设置的医疗活动。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元时有一名叫马·薛里吉思的也里可温，官镇江副达鲁花赤，曾在镇江城内外兴建了六所景教寺院，寺内也开展过医事活动。薛里吉思之外祖撒必为太医，曾为元太祖之子也哥那治病。其家善造“舍里八”（又名舍里别、舍儿别，为拉丁文 syrup 的音译），是以新鲜果汁，如葡萄、橙、柠檬等加蜜水煎熬而成的一种果汁糖浆制剂。其制法在朱丹溪《局方发挥》里也有记载：“舍里别者，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汤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丹溪还论述了它的性能“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樱桃煎之发冒火，积而至久，凝热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仅有桑椹煎无毒，可以解渴。”从其拉丁文翻译及丹溪记载推测，该药剂当来自欧洲，抑或在蒙古族西征时由欧洲传入，且在元时已作为常用药流传于世。

《元史》记载，西域拂菻（即罗马）人爱薛来中国，爱薛熟谙天文及医药知识，曾仕于元朝，司星历、医药二司事务。医药司后改为“广惠司”，主掌修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负责京城患病卫兵及京城残疾贫穷百姓的医疗工作。

元代时，罗马天主教也来我国传教，教士中有相当部分人懂医药知识。他们在北京及福州、泉州等地修建教堂，同时从事医疗活动。这种教会医疗实际上断续延展到解放前夕。

历史上中古时期，阿拉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使它成为沟通中亚与欧洲的主要通道。欧洲希腊的许多古典著

作,都有阿拉伯文的译著,他们在科学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习惯上把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统称为西域。然而因当时的欧洲医药,大部分还掌握在教会手中,医学还未成为独立专门的学科,其总体水平不高,因此,这些来自西方的医药知识,不能对中医学产生较大影响。

明清时期,造船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更为频繁,这也促进了中外医学交流。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的原因,中医学比较早地在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得到成长和发展,有些国家还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日本的曲直瀬道三、田代三喜等在中国学成回国后,提倡东垣学说和丹溪学说等。明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医书籍传入越南、朝鲜等国家。如明·李梴的《医学入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等流传越南。越南医生还参阅《内经》等中医经典,撰著中医理论书籍。如越南潘孚先撰写的《本草植物摘要》,收编的药物大都是中药材。我国药材还大量出口东南亚,在这些国家医生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信誉。

明清之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还不断派医生来我国学习医学。许多学有所成者回国后不但行医治病,有的还编纂医籍,如朝鲜金礼蒙的《医方类聚》、许浚的《东医宝鉴》、越南黎有卓的《海上医学心领》等,为传播和发展中医学作出很大贡献。

明清时代,欧洲人亦相继介绍和翻译了不少中医学书籍。中医理论、脉学、药物、针灸、人痘接种术等也传入欧洲。如16世纪50年代时西班牙传教士回国时曾带回大批中医书籍。1656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翻译了中国脉学、舌诊、中药制剂等书。荷兰人布绍夫介绍了中国针灸学,1683年,荷兰

医生赖尼又将针灸术推广到欧洲。上述的书籍和医疗技术，对当时西方医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末清初之际，中西医学交流随着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西方传教士、商人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不断掠夺资源，寻找市场，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传教士和商人们也带来了一些当时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医药知识。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这样说道：“传教士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天文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在这种总体形势下，西方的医学知识如生理、解剖和神经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也随着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活动渐渐传播开来，对有数千年历史，具有完整独立体系的中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西两种医学互相接触和比较的过程中，在时代的冲击下，我国近代医学史中一股特殊的思潮——中西医汇通思潮就应运而产生了。

二、中西医汇通的发展阶段

中西医汇通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它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制度、科学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可分为早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大体时间：早期为明代末叶至鸦片战争前；中期为鸦片战争（1840）至辛亥革命前；后期为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兹分述如下：

（一）汇通早期的时代背景及代表人物

我国在明代中叶以后，农业产品和家庭手工业逐渐出现

商品化,手工业在冶炼、纺织、造船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工商业繁荣,商业资本活跃,标志着商品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在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海外交通比以前更为发达,中外贸易繁荣,促进了中外交流日益增多。

明代末年,清兵入关,战火蔓延中国大地,经济受到了很大摧残。清朝建立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工商业亦逐步复兴,商品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甚至超过了明代。

在清代,虽然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发展遇到重重障碍。清政府一贯以稳定和巩固小农经济为“太平盛世”,对内实行“重农抑商”,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此时,经 14~16 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主要代表的欧洲各国,正处于封建主义社会崩溃,资产阶级蓬勃兴起的大变革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欧洲出现了替代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起着进步的作用。他们要求把生产力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要求认识现实和自然,要求发展科学和技术。在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诸如力学、光学、电学、磁学、热学等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作为自然科学分支的医学,随着哲学、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就,也取得了飞速发展。西方医学从 13 世纪费里德里希允许实行人体解剖,14 世纪初蒙迪诺在蒙披利埃正式实行人体解剖,并著《解剖学》教科书,至 16 世纪 30 年代维萨里著《解

剖图谱》，1543年维萨里著《人体的构造》，奠定了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基础。15世纪末，巴拉塞尔萨斯开辟了制药化学与医化学研究方向。17世纪在解剖、生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1616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1662年贝利尼发现肾脏排泄管，希而维厄斯认为消化是“发酵”作用；1664年格拉夫研究了胰液的消化作用；1667年岱尼斯首次在人体进行输血试验，胡克用人工呼吸法阐明肺的呼吸功能；1669年海厄又证明静脉血液在肺里获取空气，梅犹认识到呼吸和燃烧都靠氧气进行。这一系列的成就，使西方医学在对人体循环、消化、呼吸、泌尿系统方面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西方医学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这应归功肇始于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是它创造的实证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才给西方医学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再看当时中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在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的总体形势下，中国一批较为开明的、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开始看到西方某些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如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学等方面，并进行吸收消化。明末著名思想家徐光启（1562—1633）就翻译了很多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等。并主持编译《崇祯历书》，这是一本参考西方历法，修改中国历法的历书。他在上崇祯疏中说“万历间归化陪臣利玛窦等数辈观光入觐，所携历法等书尤为精密……故四十年议历有监正周子愚呈部乞令陪臣虔迪我、熊三拔等翻译本书，令与中历，会通归一。”（徐光启《徐文定公集》）他还明确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先，先须翻译。”（引同上）这些对中外文化交流主动积极的

态度,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一定影响。

应当看到,从16世纪后期起,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东来而传入我国的一些西方医药知识,主要有解剖、生理、病理、治疗和药物等方面的著作,然而严格地说,这些所谓的医药知识和技术,大多是附属在神学内的人体知识,以及由传教士本人带来的简单的治疗方法而已。

这一时期,参与中西医药交流的西方代表人物及著作主要有: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在华领袖。1582年奉派来中国,初在广东肇庆传教,1660年左右到达北京。他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同时介绍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医药知识。利氏在京期间,与当朝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王肯堂等相友善,过从甚密。利氏本人亦懂医术,对神经学和心理学也有研究,他利用自己的医术为人治病。曾有记载谓他治愈当时大臣李之藻的重病。李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与徐光启笃信西洋人利玛窦之学……又译《名理探》,为名学最初之译本。”(《中国人名大辞典·李之藻》)利氏还传授“脑主记忆”学说。据传利氏治愈李氏重病后,还劝李入了天主教。可见他们之间交往之深。

利氏著译有《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关于耶稣会的进入中国》、《西国记法》等。其中《西国记法》内有神经解剖方面的介绍。

随后来华的有邓玉函(Johann Terretius 1576—1630),瑞士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天启元年

(1621年)来华，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曾在澳门作第一例人体解剖术。后被明熹宗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未编成而死，继由其同事完成，即《崇祯历书》。邓氏长于哲学和医学，除修订日历外，对医学有相当贡献。著作有《人身说概》、《奇器图说》。其中《人身说概》是人体解剖学传入中国最早的著作之一。

天启二年(1622)有罗雅谷(Diego Rho 1593—1638)、汤若望(Johann Adarn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罗氏为意大利人，汤氏德意志人，均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二人与邓玉函等人共同参与修订《崇祯历书》。罗氏曾游历澳门、绛州、开封、北京等地，著译《哀矜行论》、《测量全义》、《人身图说》等。《人身图说》与邓氏《人身说概》同为较早传入我国的西医生理解剖书籍。汤氏译著有《主教缘起》、《古今交食考》、《主制群微》等。其中《主制群微》虽不是单纯的医学专著，但其中相当部分都涉及到医学。

在《人身说概》、《主制群微》等书中，均有关于“脑主记忆”的论说。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中医界接受最早、影响最大的近代西方医学知识。

在明末清初陆续前来我国从事传教和医疗活动的还有：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 1559—1654)，意大利人，传教士，万历25年(1597)来中国。1609年到北京。来华初在韶州传教，后继利玛窦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传教达58年之久。曾与罗雅谷、邓玉函合译《人身图说》。还著有《圣教日课》、《地震解》等。

艾儒略(Julio Aleni 1582—1649)，意大利人，传教士。万历38年(1610)来华，在江苏、陕西、山西、福建等地传教。

著有《几何要法》、《职方外纪》、《性学概述》等，还有《西方要纪·医学条》。其中《性学概述》、《西方要纪》等虽不是医学专著，但其部分内容与医学有关。

毕方济 (Franceischo sambiaso 1582—1649) 意大利人，传教士。万历 38 年(1610)来华，在上海、北京、开封、扬州、苏州、宁波、江浙等地传教。清兵入关，曾为南明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赴澳门求救。著《灵言蠡勺》、《睡画二答》等。其中《灵言蠡勺》虽不是医学书籍，但部分内容涉及医学。

熊三拔 (Sabbathino deursis 1575—1620)，意大利人，传教士，万历 34 年(1606)来华，随利玛窦学汉语，并成为利氏得力助手。后协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行星说》，测量北京经度，制造取水蓄水器。著《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等。其中《泰西水法》有西方医学常用药露的介绍。还有排泄、消化生理知识、温泉疗法等。

巴多明 (Dnminique Parrenin)，法国人，传教士。康熙 38 年(1698)来华。他在熟悉满文的官员、书法家和画师协助下，以满文译出皮理·弟阿尼斯(Pierre Dionis)《人体解剖学》，定名为《钦定格体全录》。当时只抄录三部，分藏文渊阁、畅春园、避暑山庄。未正式出版，影响极小。

卜弥格 (Miehel Bogu 1612—1659)，波兰人，传教士。南明永历(1647—1661)初来华。曾在南明桂王朝廷进行传教。著《中国植物志》，书中有有关脉搏、舌苔和药物的内容。

罗德先慎斋 (Brother Bernard Rhodes 1645—1715)，法国人，1699 年来华。谙脉学，精于外科，亦善制药品。初先居厦门，后入京。据载曾为康熙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生瘤之

疾。深得康熙信任，聘为御医。康熙十次外巡，罗氏均随侍左右。

罗怀忠子敬 (Brother Jean Joseph Casta 1679—1747)，1715 年来华，传教士医师。精外科及制药。在北京为教内外人治病达三十年。曾为内廷治病，不时奉召在内廷服务。

其他传教士兼医师者，还有：樊继训 (1664—1703) 法国人，精外科，1700 年来华，亦曾为清内廷服务；安泰自得 (Brother Etienne Roasset 1689—1758)，1719 年来华，精医术，亦为清内廷服务，曾随康熙外巡，受封为广储司员外郎；罗启明耀东 (Brother Emanuele Mattos 1725—1764 年)，1751 年来华，传教兼治病；巴新懋修 (Brother Louis Basin 1712—1774 年)，1765 年来华。曾奉召为乾隆第五子治病。后在宫内供职；韩国英伯督 (Father Pierre Cibat 1727—1780 年)，1756 年来华。常与俄国传教士们一起，传教兼为民众治病。

从上可见，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以传教活动为主的过程中，也将天文、历法、数学及医学等方面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输入中国。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多层次地接触中国各个阶层，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百姓民众。据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记载：“清康熙 32 年 (1693 年)，圣祖偶染疟疾，西士洪若翰、刘应等进西药金鸡纳治之，结果痊愈，大受赏赐。”即是指 1693 年 5 月，康熙患疟疾，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用西南亚金鸡纳，张诚、白晋又进其他西药，治愈康熙疟疾之事。康熙随即予这批传教士以重赏，并赐皇城西安门广厦一所——教世堂。至于利用医药活动在民间进行传教，则更普遍。美国